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7.03.018

迁徙视阈中 40 年代解放区文学与 国统区文学的互动

祝学剑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外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172)

摘要: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促进了解放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的交流互动。丁玲等作家从国统区迁徙到解放区,将国统区文学的启蒙精神等传播到解放区;茅盾、何其芳等作家从解放区迁徙到国统区,对于深入推动国统区作家学习探讨“民族形式”问题、指导国统区作家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起到重要作用。从作家迁徙视阈来看,解放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存在深层互动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区域文学研究中孤立静止的观点。

关键词:迁徙视阈;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互动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7)03-0124-05

一、前言

20世纪40年代战争导致作家离开故乡或者都市,迁徙异地,作家经历了迂回曲折的迁徙历程。作家迁徙贯穿20世纪40年代始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有规律的文学现象。20世纪40年代作家在各政治区域间迁徙,直接促进了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沦陷区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促使不同区域文学之间发生多样联系。目前研究者大多孤立静止地看待各区域文学,很少关注各区域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以解放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为参照,深入探究20世纪40年代迁徙视阈中解放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之间的深层互动,进而全面审视作家迁徙视阈中各区域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作家在解放区与国统区之间的迁徙现象

20世纪40年代,由于战争等原因,作家在解放区与国统区之间迁徙奔走十分频繁,且人数众多。抗战爆发后,许多作家从国统区迁徙到解放区。据

估计,“从1938年开始,先后有数万知识分子历尽艰险,从各个地方涌向延安。”^[1]这些知识分子当然包含众多作家。艾青、舒群、罗烽、周立波、柯仲平等或因战争,或因国统区白色恐怖,纷纷奔赴延安。艾青,出生于浙江金华一个地主家庭,后去法国留学,边做工边自学绘画、文学等艺术,1932年初回国,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后几次被捕,出狱后浪迹常州、上海、武汉、西安、杭州、桂林、重庆等地。抗战爆发后,艾青在国统区生活并无着落,在周恩来的关心和鼓励下,1941年3月迁徙到延安。柯仲平,出生于云南省广南县小南街一个中等景况的家庭,北平法政大学法律系肄业后,其辗转于上海、西安、武汉等地。抗战爆发后,他迁徙奔赴延安。罗烽,辽宁沈阳人,“九一八”事变后,与萧军、白朗等从关内流亡到关外,1935年7月到上海并参加“左联”,后辗转于上海、武汉、重庆等地。1941年皖南事变后,遵照周恩来同志指示,奔赴延安。周立波,湖南益阳人,1928年随周扬一起到上海,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

收稿日期:2017-04-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751067)

作者简介:祝学剑(1975-),男,湖北武汉人,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秘写作研究。

华北抗日前线八路军前方总部和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战救亡工作,1939年在桂林编辑《救亡日报》,接到张闻天、周扬要他去延安工作的电报,周立波与正在南方的胡乔木同路去了延安。从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到 20 世纪 40 年代从国统区迁徙奔赴解放区的作家人数众多,颇具规模,作家从国统区迁徙红色延安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作家从国统区迁徙解放区,自然而然将国统区文学的诸多元素传播到解放区。

同时,解放区红色政权为了发动全民抗战,打败侵略者,也为了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文学,经常派遣文艺骨干到国统区去领导文艺工作。这样,也有一部分解放区作家迁徙到国统区。茅盾、何其芳、刘白羽等人都是接受党的派遣从延安奔赴重庆去领导文艺工作的例子。此外,也有作家因其他各种原因从解放区迁徙到国统区。抗战爆发,上海沦陷,茅盾历经艰险长途迁徙,从新疆脱险后,经兰州、西安等地迁徙到达延安。茅盾在延安并没有停留多久,受党组织派遣,茅盾迁徙到国统区重庆领导国统区文艺工作。著名汉园三诗人之一的何其芳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作为思想改造比较彻底的小知识分子典型,受到中央领导人的认可,后被委以重任。1944年后,何其芳迁徙到国统区重庆,出任四川省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新华日报》的副社长,领导重庆文艺界整风运动。沙汀 1938 年奔赴延安后,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主任,1940 年从解放区迁徙到国统区重庆。还有卞之琳抗战初期随何其芳迁徙到延安后,在延安短暂停留,从事过临时性教学工作,后迁徙到国统区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所以,从解放区迁徙到国统区的作家也不在少数,作家从解放区迁徙到国统区对促进解放区文学在国统区的传播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

由以上分析可知,既有大量作家从国统区迁徙到解放区,也有不少作家从解放区迁徙到国统区,这种双向迁徙促进了两个区域文学之间的互动,促使解放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之间产生深层联系。

三、解放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之间的互动

作家从国统区迁徙到解放区,有意无意地将国统区文学的一些东西传播到解放区,使解放区文学显现出一些国统区文学的印记。所以在解放区文学前期,能看到国统区文学的一些东西,如启蒙精神等。丁玲、王实味、艾青等人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

丁玲 1927 年开始写作,抗战爆发后已经是全国有名的女作家,1936 年迁徙奔赴解放区延安。她是当时第一个从国统区迁徙延安的作家。丁玲到达延安之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延安各项工作中。丁玲不仅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上前线,还在行军打仗之余创作了《彭德怀速写》等诸多散文。丁玲尽管在解放区延安努力适应延安意识形态,能迅速地进行文学转型,但她还是有意无意地将国统区文学的一些东西传播到了延安。如丁玲在国统区从事新文学创作时,深受“五四”启蒙思想的影响,其 30 年代创作的《莎菲女士日记》、《韦护》等作品描写了当时社会青年男女寻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历程,流露出苦闷、彷徨的“五四”气息和启蒙色彩。丁玲到达延安后,将国统区启蒙精神传播到延安,依然没有停止对启蒙思想的追求和探索。具体表现在,丁玲在延安一边从事实际革命工作,一边写下了带有强烈启蒙色彩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小说,展现出延安民众愚昧落后的一面,对延安民众进行了一次精神洗涤。这些带有启蒙色彩的小说在延安引起很大反响。《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贞贞本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对生活充满热情,在“五四”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思潮影响下,敢于大胆追求爱情,敢于反抗包办婚姻。但被日军掳去惨遭蹂躏后,贞贞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更让贞贞受伤的是,回到村子后,村民们还是以封建贞洁观念来看待贞贞,因此贞贞受到同村人的嘲笑、挖苦、鄙视,也不被家人所理解。村民在背后指指点点,表现出看客的愚昧无聊。丁玲以悲悯情怀展示出看客村民麻木愚昧的灵魂,表现出强烈的批判蒙昧的启蒙色彩。而小说《在医院中》叙述了青年知识分子陆萍从上海产科医学院毕业来到边区一所医院工作,她热爱工作,以最好的服务对待病人。但是,陆萍这位受到“五四”启蒙思想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到达边区医院后,发现医院不仅环境脏乱破败,而且从院长、医生到勤杂人员对病人都缺乏起码的关心和同情,没有人过问病人的苦痛,他们是那么的麻木不仁。陆萍以一位启蒙知识者的眼光来打量边区的一座小医院,对麻木愚昧的民众进行了全方位透视,展现出一个个需要精神救治的愚昧灵魂。丁玲在延安时期的文学创作显然承续了国统区的启蒙精神。不仅如此,丁玲在延安还特别强调了启蒙精神对铲除封建恶习的重要性,指出:“鲁迅先生因为要从医治人类

的心灵下手,所以放弃了医学而从事文学。因为看准了这一时代的病症,须要最锋锐的刀刺,所以从写小说而到杂文。”“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几千年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他与中国旧社会是相联结着的。”^[12]丁玲从国统区迁徙到延安,将国统区的启蒙精神传播到延安,不仅促进了国统区文学与解放区文学的联系,还对于丰富延安文学创作和拓展延安文学视野都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也导致丁玲在整风运动中成为批判改造的对象^[13]。

与丁玲相似,王实味、艾青等人从国统区迁徙到延安,也主张在延安改造人的灵魂,将国统区文学的启蒙精神传播到延安。王实味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在“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下,在国统区从事新文学创作。从国统区迁徙到延安后,王实味更加惊世骇俗,创作的仅有的两篇杂文《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都凸显出强烈的启蒙精神。《政治家·艺术家》以启蒙知识者的眼光指出了旧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及其改造人的灵魂的重要性,认为“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14][9]}。所以王实味强调在延安改造人的灵魂的迫切性,“这是残酷的真理,只有勇敢地正视它,才能了解在改造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更严肃更深入地做改造灵魂的工作,以加速前者底成功,并作它成功底保证。”^{[14][12]}王实味在解放区延安提出要改造人的灵魂,明显地继承了国统区改良人生的启蒙思想,表明其从国统区迁徙到解放区延安后将国统区启蒙精神传播到解放区。而《野百合花》由多篇杂文组成,全方位扫视和深入解剖了延安的诸多落后现象。如《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批判了延安社会的等级制度与不均现象。王实味从国统区迁徙到延安后仍然高扬国统区文学的启蒙精神,将国统区文学启蒙精神传播到解放区延安,必然与延安的文学体制产生激烈冲突,导致他日后在整风运动中成为批判的对象。艾青迁徙到延安后,也坚持“五四”启蒙精神,将国统区文学启蒙精神传播到延安。受启蒙精神的影响,艾青在延安创作的杂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也流露出启蒙意识。艾青在这篇杂文中强调:“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

乐人的歌妓。他的竭尽心血的作品,是通过他的心的搏动而完成的。他不能欺瞒他的感情去写一篇文章,他只知道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去描写事物,去批判事物。在他创作的时候,就只求忠实于他的情感,因为不这样,他的作品就成了虚伪的,没有生命的。”^[15]艾青的杂文指出了独立自由精神在作家创作活动中的重要性,凸显出启蒙精神。这些都是作家从国统区迁徙到解放区,将国统区启蒙精神传播到延安的真实表现^[9]。抗战时期,大量作家从国统区奔赴迁徙延安,有意无意地将国统区文学的启蒙精神等相关元素传播到延安。因此,延安文学前期彰显出来的启蒙精神不是空穴来风,它是随着作家从国统区迁徙到延安而来的。这种迁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统区文学在延安的传播与交流。

作家从国统区迁徙到解放区促使国统区文学传播到解放区,反过来,作家从解放区迁徙到国统区也促进了解放区文学在国统区传播。如上文所述,解放区亦有许多作家迁徙到国统区,受上级派遣迁徙到国统区的作家肩负的使命更明确,目的性更强,产生的反响也更大,对文学的影响也更大。上文论及的茅盾案例颇能说明问题。茅盾受上级指派从延安迁徙到重庆,肩负在国统区发展革命文艺的重任,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迁徙,更好地促进了解放区文学在国统区的传播。茅盾从解放区迁徙到重庆后,重庆文艺界领导人郭沫若、田汉等到茅盾住处与茅盾见面,茅盾将解放区文学介绍给大家,使大家了解解放区文学的最新动态,了解延安文艺情况。不仅如此,茅盾迁徙到重庆,深入推动了国统区文艺界“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众所周知,“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本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一次重大文艺论争,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影响和推进下展开的文学论争。1938年,抗日战争持续进行,同仇敌忾的对敌斗争导致民族意识张扬,文学民族化随之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论追求。毛泽东在此情势下提出了“民族形式”的口号。“民族形式”问题论争随即在解放区展开。初始,周扬、艾思奇分别发表《我们的态度》和《抗战文艺的动向》,陈伯达也同一时间在《新中华报》上发表《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在延安揭开序幕。不久,艾思奇和陈伯达又分别发表《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两篇文章,继续论争“民族形式”问题。《文艺战线》1939年

6 月和 11 月两次开辟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专题,发表了冼星海《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沙汀《民族形式问题》、罗思《论美术上的民族形式与抗日内容》、何其芳《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萧三《论诗歌的民族形式》、艾思奇《旧形式,新问题》、杨松《论新文化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柯仲平《介绍〈查路条〉并论创造新的民族歌剧》和《论文艺上的中国民族形式》等文章,在延安掀起“民族形式”问题论争高潮。这些文章代表了当时延安对“民族形式”问题的看法。之后民族形式论争逐渐扩散到国统区。虽然在茅盾迁徙重庆之前,“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已经扩散到国统区,但国统区对“民族形式”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片面,甚至有错误。为推进“民族形式”问题论争,茅盾专门参加田汉以《戏剧春秋》社名义召开的座谈会,并与陈望道、老舍、阳翰笙、洪深、郑伯奇、杜国庠、胡风、安娥等重庆文艺界三十多人见面,“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想把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引向更深更广,所以除作家、评论家外,还有戏剧家、音乐家、画家参加讨论。”^{[6]232} 在座谈会上,茅盾“介绍了延安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意见和讨论经过,也谈了自己的基本观点”,还说“建立中国艺术的民族形式,要紧的是深入今日中国的民族现实,向现实生活学习。因为现实生活是主导的东西,只有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才能更正确地接受固有的遗产和外来的影响”^{[6]232}。并且,茅盾此期专门写有长文《抗战期间中国文艺运动的发展》,其中列述有专门章节《关于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问题》阐述对“民族形式”问题的理解,是“针对国统区的文艺论争而写的”^{[6]237}。茅盾迁徙重庆,不仅引导国统区文艺界正确理解认识“民族形式”问题,而且为国统区“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做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对深入推动国统区文艺界“民族形式”问题讨论起到重要作用,对促进解放区与国统区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所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可见,作家从解放区迁徙到国统区不仅促进了解放区文学在国统区的传播,而且促进了两个区域之间文学的交流互动。

茅盾迁徙重庆产生巨大反响,促进了解放区文学在国统区的传播,何其芳、刘白羽受上级指派从解放区迁徙到重庆,对于推动国统区作家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精神,推进《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讲话》之后,出席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何其芳、刘

白羽被指派到重庆宣传《讲话》精神。何其芳、刘白羽肩负明确的革命任务迁徙重庆,更能起到在国统区宣传《讲话》的目的,因而更能促进解放区文学在国统区的传播。迁徙重庆后,何其芳、刘白羽通过郭沫若组织召开文艺界人士会议,向统一在“文协”旗帜下、战斗在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详细地介绍了《讲话》相关精神,对延安的秧歌、解放区文艺的蓬勃发展做了详尽介绍。在何其芳等人的努力下,1944 年 11 月,重庆文艺座谈会召开。重庆国统区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讲话》精神,自觉以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文艺批评和创作,国统区掀起学习《讲话》的高潮。1944 年元旦,《新华副刊》整版分别以总题《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和三个分题“文艺上的群众和如何为群众”、“文艺的普及和提高”、“文艺和政治”发表《讲话》的主要内容,并向国统区印发了大量《讲话》的小册子。此后,《新华日报》还多次突出宣传《讲话》主要精神,并组织陕北秧歌演出,以实际行动宣传贯彻《讲话》精神。1945 年,《新华日报》社公开出版了《讲话》的单行本,使《讲话》得以在国统区全文公开发行。在《讲话》精神指引下,解放区文学优秀作品《兄妹开荒》、《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等也都相继传入国统区^[7]。《讲话》在国统区产生巨大影响,使国统区文艺统一到《讲话》的旗帜下,国统区作家们发出了走进大众、走进生活的呼声。何其芳、刘白羽受党的指派迁徙到重庆宣传《讲话》精神,不仅将《讲话》传播到重庆,并以《讲话》精神为指引,组织重庆文艺整风运动,指导国统区作家文学创作,收到实际的效果。何其芳、刘白羽迁徙重庆,以明确的目的和行动推动了解放区文学在国统区的传播,为解放区文学成为全国性的主流文学做好充分的铺垫。

四、结语

作家迁徙是 20 世纪 40 年代促进解放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联系的主要动因。作家在解放区与国统区之间的奔走迁徙有力地促使了解放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相互间深层次的交流互动。大量作家从国统区不断迁徙到解放区,将国统区文学的启蒙精神等相关要素传播到解放区,同时作家从解放区迁徙到国统区,将解放区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讲话》精神传播到国统区。从作家迁徙视阈看,解放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并无完全隔绝,而是存在深层互动关系。且从作家迁徙视阈来探究两者间的

互动,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即虽然从国统区迁徙到解放区的作家人数远远多于从解放区迁徙到国统区的作家人数,但解放区文学对国统区文学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国统区文学对解放区文学的影响力。这说明了解放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之间互动交流的不平衡性与复杂性。

从作家迁移视阈来考察解放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之间的互动,也启发我们要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来分析各区域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往研究者用孤立静止的眼光看待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各区域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不到区域文学关系的深层本质。从作家迁徙视阈来看,解放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存在深层互动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区域文学研究中孤立静止的观点。因此,从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视阈来理解

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之间的深层互动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赵学勇,孟绍勇.“文学中心”的转移与当代文学“新方向”的确立[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108-115.
- [2] 丁玲.我们需要杂文[C]//雷加.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散文杂文编(二).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1158.
- [3] 祝学剑.论延安启蒙文学的三种精神取向[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29-32.
- [4] 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C]//黄昌勇.王实味:野百合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 [5] 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N].解放日报,1942-03-11.
- [6]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 [7] 章绍嗣.《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和影响[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1):80-84.

(责任编辑:许桃芳)

An Intera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in the Liberated Area and Literature in the Kuomintang Controlled Area in the 1940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riter's Migration

ZHU Xue-j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henzhe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henzhen Guangdong 518172, China)

Abstract: Writer's migration in the 1940s promoted intera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in the liberated area and literature in the Kuomintang controlled area. The writers such as Dingling and so on migrated from the Kuomintang controlled area to the liberated area, and transmitted the spirit of the enlightenment and so on the Kuomintang controlled area to the liberated area. On the contrary, the writers such as Maodun, He Qifang and so on migrated from the liberated area to the Kuomintang controlled area,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s for further promoting writers in the Kuomintang controlled area to study the "national form" problem and guiding writers in the Kuomintang controlled area to study the spirit of the Spee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riter's migration, there is deep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in the liberated area and literature in the Kuomintang controlled area, and to a certain degree, it breaks through the views of isolated and static in the research of regional literature.

Key words: the perspective of writer's migration; literature in the liberated area; literature in the Kuomintang controlled area; interaction